

霍尔果斯、瑞丽成 新宠 交通条件改善增加商机

边境小额贸易接地气生长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近年来,我国沿边开放和边境小额贸易取得较快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今年1至4月,边境小额贸易出口622.5亿元,同比增长20.9%。新疆、云南、黑龙江和广西等边贸重地的边境小额贸易都得到发展。这其中,由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和云南的瑞丽口岸在我国边境小额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受到关注。

《中国贸易报》记者在采访中留意到,在新疆霍尔果斯、云南瑞丽等边境城市都有一些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公司。在霍尔果斯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刘先生经营着聚丰保税店。他向记者透露,这一边境合作中心吸引着来自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客流,其中30%至40%的顾客来自哈萨克斯坦。记者也了解到,霍尔果斯边境口岸近年来功能强化和条件改善,正在吸引各地商人前往淘金,这也改变着人们对边境地区的固有印象,边境地区不能和闭塞落后、人烟稀少划等号,商贸和人流也可以很繁荣。

在云南,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也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物产丰富以及可以从基础做起也是云

南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的一项优势。记者在云南瑞丽等地了解到,有些公司就从农产品边贸做起,有些公司是在主业之余顺便做一些边境小额贸易。瑞丽市华德边贸有限责任公司是当地一家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企业,该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公司进出口贸易都做,比如会做一些农产品进出口业务,而主要的贸易对象就是缅甸,因为当地靠近缅甸。他说,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对边境小额贸易的扶持政策,我们感受到了。

云南红瑞柠檬开发有限公司人士告诉记者,该公司也会做一些特色小商品的边境贸易,不过这项业务在公司所占的比重较小。在他看来,瑞丽、河口等边境口岸的知名度和发展都还不错。而云南德宏一家机械公司人士则向记者坦言,自己公司的边境小额贸易业务运转情况并不理想。在采访中,也有当地学者向记者推荐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认为这一地区的边境小额贸易发展不错。

通过梳理云南边境小额贸易发展情况可以看到,虽然面临交通条件不便、城市化水平不高和基础设施薄弱瓶颈,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到

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的逐步落实,云南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潜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挖掘。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正在修建的中老铁路。这条铁路2016年12月全线开工,线路全长414公里,建设总工期5年,计划在2021年12月建成通车。

如果说云南正在通过修路等举措改善边境小额贸易的基础设施和保障条件,那么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可以看到的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已经对边境小额贸易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助推作用。霍尔果斯口岸既是公路口岸也是铁路口岸,公路铁路多种运输方式的结

合给商家和企业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聚丰保税店刘先生还向记者介绍,对当地来说,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各有其适用范围,比如有些货物更适合公路运输。由于大部分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口岸开出,物流更方便了,运输时间也缩短了。刘先生说。



图为从塔什干出发、载有乌兹别克斯坦绿豆的中亚班列驶抵西安新筑车站。5年来,从西安出发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货物品种从单一走向丰富多元,班列数量飞速增长。(欣华)

出口玩具示范区 强化综合服务见成效

■ 吴颖 孙园园

深圳龙岗出口玩具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玩具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辖区内的出口玩具制造产业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有着产业集聚性强、辐射范围广、规模优势大、产品类别齐全、质量管理强的特点。继2016年成功创建省级出口玩具安全质量示范区后,在龙岗区政府主导下,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在2018年又迈上新征程,也为区内出口玩具生产企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出口玩具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工作受到了龙岗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成立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形成了产品质量联合治理、示范区联席会议制度等合作机制。

出口玩具安全质量示范区建成以后,给地方经济发展、质量强区带来了良好的增益效应。区内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企业诚信、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高于龙岗区出口玩具产业的整体水平。近一年未发生质量原因的国外通报和召回案例,并且区内的出口外贸形势也较为喜人。国外中高端产品市场的订单较去年增长7%至10%。

建区后,出口玩具产业集聚区的综合服务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又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示范区建设联合工作组在区内积极搭建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在示范区内发布了进口国(地区)标准、技术法规、国外通报、召回、退货及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等信息。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示范区逐步显现出更加强大的风险抵御能力和产业发展潜力。

◆连线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推新举措 企业通关时半功倍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实习记者 孟思洁

近日,上海市口岸服务办公室联合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召开优化上海口岸跨境贸易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专场政策解读会。根据上海官方此前发布的《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上海海关等多家单位制定了上海口岸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17条措施,上海自贸区口岸通关提货时间将压缩1/2。这次官方发布对于拟在上海自贸区通关的企业来说,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

上海自贸区是如何实现此次大幅度通关提速的?上海海关学院培训部主任、世界海关组织认证专家张树杰解答了记者的疑问。他说,201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虽然文件中只有简简单单几个字,但这次机构改革的意义却非凡。张树杰解释说,过去的海关一体化改革都没有触及到核心,而这次改革的层次之高、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进而在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方面,对上海自贸区带来的效果自然是以前历次改革不能比拟的。

这次上海自贸区的通关提速一定要放到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北京睿库贸易安全及便利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小平指出,跨境贸易是衡量一个国家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目前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世界第78位,这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要提高营商环境排名,必须注重跨境贸易服务,促进贸易便利化。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上海市为实现“建设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目标”,在海关建设上采取了众多有效措施,包括建立一体化通关体系和前推后移的通关新模式,这些经验都

非常值得全国其他地区借鉴。

对于此次上海自贸区通关提速的意义,两位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树杰提出,上海市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到全国将近1/3,自贸区通关效率提高有利于直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江小平强调,这次的通关提速对于淘汰过去低效率、低速度、高成本的通关制度体系,建立高效率、高速度、低成本、低成本的通关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张树杰还说,上海自贸区发挥着在全国进行“先行先试”的带头作用,如果能将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辐射全市、全国,那对于上海市乃至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谈到未来海关工作重点时,两位学者都认为一定要尽快建立单一窗口制度。现在国内单一窗口建设最大的问题在于“烟囱”太多,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单一窗口,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张树杰说,全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窗口,因此一定要尽快落实全国单一窗口建设,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像淘宝等电商平台那样,实现“足不出户”的快捷。

以前海关检查货物,都将集装箱里的货物全掏出来,非常费时费力,而现在“X”光机检验技术使货物在集装箱里就能完成检验,大大方便了外贸企业和工作人员。江小平还向记者介绍,除了“X”光机检验这种“非侵入式”的检验,目前很多“侵入式”探测器也逐渐得到了运用。特别是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直接代替人做检测,应该将这些先进技术尽快应用起来。江小平强调。

谈到海关建设目标,两位专家都强调“提速”并不是海关建设的唯一目标。张树杰说,虽然我们现在把“快”作为一个标准,但并不是越快越好。两位学者认为,海关改革一定要建立在贸易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在国家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

5月13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表示,其正为中兴提供一条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这意味着中兴事件将出现重大转机。随后,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5月14日表示,中方十分赞赏美国的积极表态,正与美方就落实具体细节保持沟通。

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发布禁令,禁止美国公司在长达7年时间内向中兴出售产品,这导致严重依赖美国核心元件进口的中兴通讯几近覆灭。5月9日,中兴发布公告称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已无法进行。而特朗普的公开表态无异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兴是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手中的砝码,特朗普此时发推特表态,惊喜之余其背后的原因还需我们细细推敲。

首先,美国解禁中兴最重要的原因是中美双方高层的谈判。作为中国科技行业的巨头,中兴不仅是一个年营收千亿元人民币、拥有8万员工、涉及数十万就业岗位的巨型企业,也是中国5G通信争夺战的

主力军,大而不能倒。中国政府一直在帮助中兴斡旋协商。5月3日至4日,在中美经贸磋商中,中兴事件也成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的重要砝码,寄希望于利用中兴这张牌在谈判桌上施压中国。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双方手中都有砝码。高通斥巨资430亿美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的交易在中国遭遇反垄断审查,如果中国监管当局继续否决,高通将面临20亿美元的违约金,同时失去重塑半导体行业格局的机会。此外,如果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对于特斯拉而言亦如晴天霹雳。2017年来自中国市场的营收占到特斯拉总营收的17%,并且2018年特斯拉一季报中净亏损创新高,中国市场对特斯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解禁中兴之举也迎合了美国产业利益。中兴高管称,中兴公司2017年向211家美国出口商支付了一季报中净亏损创新高,中兴事件发生后,美国光学零部件制造商

Acacia Communications、Oclaro等公司的股价应声大跌。加利福尼亚光学设备制造商NeoPhotonics在4月份声明称,该公司与中兴及其供应链合作伙伴预计的年收入增长率将达到5%,而这些业务约占NeoPhotonics总收入的3%。中兴是美国市场上的第四大手机供应商,为美国提供了13万个高科技工作岗位。中兴禁令会为美国主要供应商的收入和就业带来可以预见的损失。

最后,中国进口芯片早已超过2000亿美元,2017年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共计667亿美元。中兴事件一出,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核心领域创新能力的不足,同时英国知名芯企ARM公司成立中国合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势在必得,三星等众多企业都宣布开展芯片研发,日韩、欧洲正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美国主动打破了中国市场上的“铁饭碗”,一旦他国竞争对手趁虚而入,美国再想夺回市场绝非易事。因此取消对中兴出口的限制不仅有

利于中兴,更符合美方利益。

由此可见,中美政府间的斡旋是美方解禁中兴最重要的原因。

纵观此事,美国对中兴的制裁实则是“杀鸡儆猴”,也给在美的其他外国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国家间的冲突很可能导致企业被殃及。中兴事件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商誉,动摇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投资和营商环境稳定的信心。

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干预行政执法事务已属罕见,这表明中兴事件的解决已经得到了重视。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的公开表态具有重大意义。经过此次事件,不仅是中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更应意识到自主创新与高新技术研发的重要性。要想不受制于人,只有把核心技术和关键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行业和国家的发展才能长治久安。而对中兴恢复芯片供应,并不代表中美贸易摩擦画上句点,在与美国的经贸磋商中,中国仍然应在守底线、在夯实产业基础的同时维护好国家利益。

聚焦 境内关外 推动自贸港创新

■ 朱煜

内+围网外 方式 海关特殊监管区属于物理围网内,现有新区、园区划入部分属于围网外。广东自贸试验区条例将相关表述变为“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境外之间的管理为一线管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境内区外之间的管理为二线管理”。一线,地区不能等同于自贸试验区全域,仅适用于自贸试验区范围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一线放开,政策的适用范围有限制,主要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监管服务,注重货物保税功能,对进出口税收而言处于一线,但对人员、资金、信息流动和技术转移的监管服务尚未实现“一线放开”。

同时,国家法律未赋予自贸试验区“境内关外”地位。国家未对自贸试验区专门立法,境内外法律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国家对自贸试验区采取“一事一议”改革授权路径,开创了法律因地调整模式,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全国人大针对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需要,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或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此后修订了《立法法》第13条规定,赋予该方式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国务院在自贸试验区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及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在此前提下,口岸部门的监管不能突破法律边界,需依法履行“检查进出境运输工具,查验进出境货物、物品”法定职责,尤其对自贸试验区非围网区域做不

到免于惯常监管,在国际中转、集拼、分拨、离岸贸易等业务进出境手续简化方面存在较大的政策约束。

境内关外 是自贸港改革关键点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建出新意,围绕“境内关外”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是关键点,可从改革授权路径创新、监管模式与技术创新、基于培育功能的政策创新三方面着手。

一是充分赋予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的改革自主权。“境内关外”性质的贸易便利化改革将不再局限于传统货物贸易,而是各类要素进出境便捷流动的深层次改革,需要海关、海事、外汇、税务、工商、移民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对改革系统集成、政策配套衔接要求更高。因此,若自由贸易港未能实行“国家行为、专门立法、单一机构”的管理体制,则需用活改革授权机制,要将中央批复自由贸易港指导意见或总体方案中涉及的支持、研究、探索、鼓励等不明确授权的改革事项,全面下放具体政策设计权,不走“地方提出改革诉求,国家部委给予若干政策”的老路,由自由贸易港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制定出台行政法规、章程、实施条例等。针对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向国务院申请对自由贸易港豁免所有涉及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政策规制,另起炉灶,构建自由贸易制度与政策体系。

二是利用机构改革契机,推动口岸部门职能转变。构建新海关与其他部门的口岸管理一体化运行机制,转变单证与货物流转同步作法,追求事前管住的监管理念,以“合格假定”原则推动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实施国际货物入区不申报、不征税、不查验、不统计、不设账册。强化风险防控,实现“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建立以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和商品溯源及责任追究制度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进一步简化多式联运的物流畅通与保税流转手续,将“管少、管精、管准”的理念贯穿于口岸管理全过程。

三是基于培育高端经济功能,对贸易监管政策专项突破。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不再以加工贸易为重点,而是围绕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目标,探索口岸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培育离岸贸易、离岸研发、国际船舶管理、航运金融、大宗商品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功能平台等高端经济业态,建设电子围网和高效集约监管平台,严格区分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配套实施限额内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账户,深化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

(作者系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